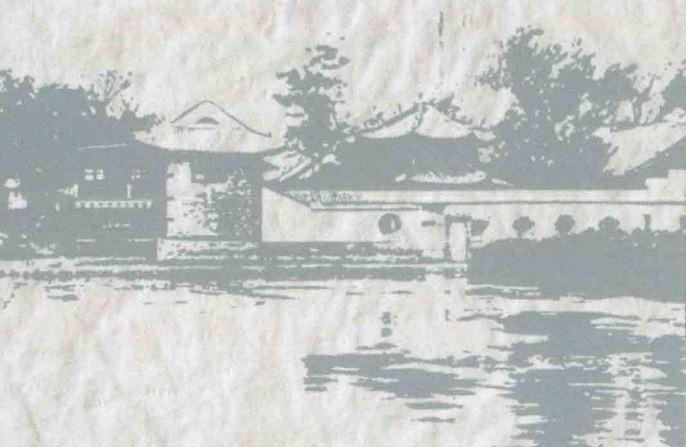


20世纪30年代

『再生派』学人的民族复兴话语

◆ 魏万磊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世纪30年代

『再生派』学人的民族复兴话语

◆ 魏万磊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 30 年代“再生派”学人的民族复兴话语 / 魏万磊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5004-9468-3

I. ①2… II. ①魏… III. ①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D092.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12893 号

责任编辑 王 琪 雁 声
责任校对 王俊超
封面设计 大鹏设计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1.125		
字 数	350 千字		
定 价	3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记得自己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读博时，蔡乐苏教授非常喜欢用通俗的比喻告诉我为学的道理。他说：如果把历史比作一条河，那么今天的我们是站在下游看上游，这就像是我们在农村看电线杆时的情况，离我们越远，这些电线杆看上去距离越近，甚至被压缩为一个点。我们做历史的，任务就是将这个点解放出来，让它恢复成真实的距离。这句话让我想起卞之琳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也就是说，面对一则历史材料，有三重关系必须清楚：当事人意图表达并希望人们如何理解他的观点；同时代的人对他的观点采取了何种观点；当下作为研究者的你本人对以上观点的观点。因为历史人物在特定时刻的特定言论面对特定的读者群表达特定的意图，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可以区隔为大语境、中语境和小语境。鉴于此，我一度将老清华的治史路径理解为“历史还原论”，至少是剑桥学派昆廷·斯金纳式的“语境还原”。就我个人的学术背景而言，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到政治学再转向历史学，从追求文学的浪漫到追求历史的本真，在“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之间，我个人是更倾向于“史观学派”，非常想找到思想家背后永恒的问题意识，认为非此不足以表明学历史的资鉴功能和现实意义。

但是，踏入历史学的门槛后，我自己的心理也发生了变化，

觉得真实记录一个民族走过的路、塑造真实的国家记忆，这本身就是价值，是一个民族寻根的认同之旅。历史学不再是一门学科，而变成了个人审美的工具，是令人销魂的爱好，是个人兴趣酝酿的源泉，是用以领略古人情感和全部人性的途径。而面对史实的分析和解读，我们就要对自己认识历史的能力进行反思和批判。正如何兆武先生所言：“如果不经过这一批判就径直着手阐释历史的形而上学，那就好比是飞鸟想要超过自己的影子。”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更客观、更真实的理解历史原貌？我还是借用蔡乐苏教授的比喻：史学观点像头发，是从肉里长出来的；而不是衣服，从外面给披上去的。这就像郭橐驼种树，树的生长有自己的规律，我们史学工作者必须要“顺其性而为之”，万不可按照自己的性子裁剪枝叶，随意翻动。好的作品像是一张网，有网眼但不会有漏网之鱼，因为编织这个网的线非常柔韧。我个人理解，史料就是编织历史之网的丝线，史料是否扎实、编织方法是否得当，是决定网质量好坏的关键。

学历史的人通常会有这样的感觉：有些时段，历史长河波澜不惊、波光粼粼；有些时段，则潮起潮涌、蔚为壮观。而历史潮头最集中的体现就是时间流动中的不同论域的出现，因为正是这些花团锦簇的话语丛，推动先进思想在某个时空中形成陡然紧凑、集结成峰的历史画面，推动历史冲破空间的限制形成一个永恒的问题意识，使得历史在可比较的层面上属于全人类共同的话题。在这一点上，这些涌动着的言语无疑是历史的引擎，让历史在昏昏欲睡、平淡无奇中显现出生命的活力，这才是历史的精气神。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就出现了这样的历史画面，从广义的角度看，一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可以说就是争论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的历史。在建立民族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大目标上，先进的中国人基本没有异议，但在实现的手段、途径、方案等方面，却有着很多争论：政治方面有“民主与独裁”论战；经济方

面有“现代化”论战；文化方面有“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论战；社会方面还有 20 年代社会史论战的继续。

1932 年，以玄学派为主要班底，以中国国家社会党为组织基础，以《再生》为主要言论载体，“再生派”最终形成，他们接续了“科玄论战”中远未终结的话题，在“民族复兴”的主流话语中表达了他们的现代性理念和方案。他们所表达的现代性方案内在要素众多，含混性和复杂性是最明显的特征，试图用现有的知识分类将其描述清楚异常困难。但其带有浓厚的调和色彩。“再生派”的民族复兴话语立足于自由主义的基调，照顾了中国社会各方面的诉求，吸收了西方不同的理论主张。在政治上，他们调和了国家权力和个人自由，形成“修正的民主政治”主张，并通过代议制和选举制将修正民主政治与社会平等参与调和起来。在经济上，他们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国家、社会和个人在生产中的关系作了适当的调和。在文化上，他们调和了淑世主义与自由主义，将效率、平等与自由、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作了适当折中，超越了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的文化倾向。基于此，笔者姑且称之为“调和型自由主义”。本书将以“再生派”学人群为个案，展现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这一重要的面相。“调和型自由主义”是在对五四时代现代性观念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彰显了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一批知识分子对范式危机（现代性危机）的重新思考。

从中西比较的角度上看，西欧中世纪的黑暗引起了两方面的反抗：因其迷信和愚昧，人们以理性反抗之；因其专横与不公，人们以救赎精神（所谓道德理想主义）反抗之。西方文明的两大源头——希腊的理性所代表的科学主义以及希伯来救赎精神所萌生的人文主义，二者共同瓦解了中世纪并推动人们走向近代。中国当代学者借用了这种理解，并将目光投向了对中国封建社会解体的解释。张灏曾用“范式危机”理论解释从甲午战争到北伐战

争这一“转型时代”，五四时期被包含在其中，其根本任务是从儒家意识形态范式向现代性范式转变，主要解决道德、信仰层面的意义危机以及社会政治层面的秩序危机这两方面的问题。高力克进一步指出，因儒家意识形态崩溃而造成的意义危机和秩序危机真正凸显出来是在五四时代，正是五四运动使晚清以降师法西方的现代化运动陷入了范式危机。自 19 世纪中叶至今，中国的现代性转型仍然没有彻底完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许纪霖甚至将 20 世纪的中国思想史看成“一部范式转换的思想史”。简言之，“范式危机”理论可以看做是用来描述转型时期自由知识分子在建构中国现代性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解决方法，利用这一理论来观察自由知识界的现代性理念是一种不错的视角。

但是，研究者也同时承认五四时期并未真正解决这种范式危机，后五四时代的知识界在面对这一问题时的解决方案怎样呢？诸多学者的研究似乎有意无意地把目光移开。应当承认，在很长时期内，对 30 年代的思想史研究较之此前此后的历史时段都显得较为薄弱。这样一来，造成我们只知道果树发芽和成熟收获的两端，而忽略了其生长过程，更无论这其中还有五彩缤纷的花期、风吹雨打的磨难。

近些年，对这一历史时段用力的学者渐有增长，但在方法论方面，仍不免笼统的“贴标签”做法。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品牌”式的包装极易造成同名联想式的误读，使得历史解释在不同语境、不同层面、不同含义上发生激烈争论，而本质上却无益于知识存量和流量的增加。这种做法还限制了研究者思维的丰富性和层次感，使研究者容易形成“套用”的心理习惯。更为遗憾的是，真实的历史脉络在“化约论”（Reductionism）的思维方式下被遮盖。本书试图摆脱先入为主的观念，防止其干扰历史判断，展现历史被压缩的多个维度，能否做到这一点，就看读者的评判了。

思想的发展并未遵循直线进化的逻辑，现实生活中的诸多问题也不会“随着主义的解决而解决”，或者说不会随着政权的尘埃落定而迎刃而解，“调和型自由主义”体现出的思想价值，并没有随着胜王败寇的历史叙事而烟消云散，今天的中国，也许正在不自觉地走向这种“调和的智慧”。

“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在社会文化进入了一个颠覆传统与精英主义、消解一切深度和意义的“无厘头”时代，谁又能够在世间喧嚣中让自己安静下来，读上几本书，与这些已经载入“点鬼簿”的思想者作跨越历史时空的深度交流呢？谁又能够在长久的安定、慵懒中给自己注入一些前进的动力，实现自我价值的慢慢趋进呢？上学期间的作品未免青涩，但我始终认为，管窥蠡测聊胜于村姬说鬼，权且自勉。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研究对象、选题缘由与选题意义	(1)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17)
第三节 问题意识、时间截取与研究思路	(34)
第二章 “再生派”学人与民族复兴话语谱系	(45)
第一节 《再生》和“再生派”学人群	(47)
一 《再生》的编辑发行、办刊宗旨和社会影响	(47)
二 《再生》办刊的困难	(54)
三 “再生派”学人的聚合与人物谱系	(63)
四 “再生派”学人的历史谱系	(74)
第二节 民族复兴话语	(81)
一 “民族复兴”话语兴起的原因	(81)
二 “民族复兴”话语谱系的形成	(94)
三 “民族复兴”的几种倾向 ——兼论抗战重心的地域转向	(104)
四 “再生派”学人在“民族复兴”话语谱系中的定位	(116)
第三章 破中有立：“科学”、“民主”的再阐发	(122)
第一节 “再生派”学人对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的	

批判性反思	(123)
一 “文化立国”与国联教育考察团报告	(125)
二 “科玄论战”的余绪	(131)
三 反思中国现代知识体系	
——兼论文化立国的后期发展	(145)
四 缘何两派成路人:朋友眼中的张君勱与胡适	(160)
第二节 领袖之争与“再生派”的民主观	(168)
一 民主与独裁论战的语境	(169)
二 一个领袖	
——是蒋是汪还是胡	(173)
三 民主的制度化建设与民主生活习惯的培养	(184)
四 小结:君道、政道与“再生派”的民主观	(191)
第四章 经济之途:国家社会主义	(198)
第一节 国家社会主义提出的背景	(199)
一 引论	(199)
二 现代化论战	(204)
三 检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210)
四 反苏俄不反计划经济	(214)
第二节 国家社会主义的内涵	(219)
一 集产主义、普产主义与行会自治主义的调和	(219)
二 作为经济政策的国家社会主义	(227)
三 吸收了民治主义精髓的国家社会主义	(232)
第五章 政治之途:修正民主政治与民治主义	(241)
第一节 权力与自由	(242)
一 修正民主政治的哲学基础:唯实的唯心论	(242)
二 “再生派”学人的政治价值观	(248)

三	“再生派”对国民党训政的批判与宪政思想的提出	(254)
第二节	行政效率、个性差别与平等参与	(259)
一	修正的民主政治	(260)
二	强调社会参与和机会平等的民治主义	(268)
三	代议民主制与选举制	(271)
第三节	国家民主政治的实现	(274)
一	对“修正的民主政治”批评的批评	(274)
二	告别革命：自由主义阵营的共识	(277)
三	政治调和论的流风遗韵	(280)
第六章	文化之途：理性的文化民族主义	(287)
第一节	“再生派”学人的文化观和教育观	(288)
一	文化有机体论	(288)
二	教育青年论	(294)
第二节	自信心与“新民”	(303)
一	民族复兴与自信心	(303)
二	国民人格的再造	(309)
第三节	民族复兴的可能性	(314)
第七章	结论	(319)
参考文献		(327)
后记		(344)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对象、选题缘由与选题意义

民国思想史研究中，派别较多，各派之间相互勾连而内部又错综复杂，不同时期各派又会因利益调整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发生重组，缺乏统一的分派标准。较为普遍的做法是，将有大体一致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追求的一群人称为一派。因为对于在野团体和个人来说，要使得自己的发言有分量，就必须有号召力，“号召的基础，一是办学校，二是办报纸”^①。所以这些人常以文墨结缘，围绕一所学校、一本杂志或者其他的言论平台结为一派。有些较为松散，除了骨干成员的定期集会外，较少组织直接参与政治的活动。譬如“独立评论派”、“新月派”等。有些则组织严密，有固定的机构，保持着高度的政治参与热情。

本书的研究对象“再生派”学人群体属于后一类派别，“再生派”学人是以《再生》杂志为言论平台组织起来的一批自由知识分子^②，

① 袁道丰：《张公权先生谈往录》，《传记文学》（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第16卷第1期（总第92号，1970年元月1日）。

② 因为“再生派”中有许多非国社党党员，所以作为群体，有时也用“自由知识分子”来指代他们。本书所指自由知识分子不是在与团体型知识分子（如组党派）对立的意义上使用的，而是就思想自由和在野地位而言的。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也不是专指那些严格意义上以学术为业的人，而是一系列有独立思想、自由精神，能作出反应和进行表达的个人。因此，可以在这一意义上将知识分子理解为“自由知识分子”。参见〔美〕杰罗姆·B. 格里德尔《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单正平译，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作者自序中对知识分子的界定。

大多数具有中国国家社会党党员的身份，以组党方式参与政治和社会改革。还有一部分属于非国家社会党成员，但其政见与国社党不存在实质性的分歧。“再生派”可以说是民国时期存在时间较长的一个派别，它最初是由一部分“新路派”、“时事新报派”和从“新月派”分离出来的“人权派”乃至吸收了一些政界名流、学者教授组织起来的。虽然此前的研究并没有“再生派”的提法，但“张君勱组党派”的提法却是存在的，并且在思想理念上与胡适派学人群相对立而存在：“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中国知识界在国民党之外主要有以胡适代表的不党派和张君勱为中心的组党派。胡伟希将其称为功利自由主义和修正自由主义的对立，许纪霖将其称为观念的自由主义者和行动的自由主义者的对立，张汝伦则将其成为西化的自由主义与本土自由主义的对立。”^①在这里，笔者认为，“张君勱组党派”的提法欠科学，因为很多具有相似政治理念的自由知识分子并不具有中国国家社会党的党籍，他们在《再生》上发表文章，补充完善甚至在更深层次上诠释了这种理念，也正是因为这些党外人士构成了思想界的相互呼应之势，才突出了该派的影响力，所以将他们排斥在外有些不妥。基于此，笔者认为还是称之为“再生派”较为适合。

笔者也不同意将“再生派”的思想主张称之为“修正自由主义”、“行动的自由主义”或“本土自由主义”。因为“修正自由主义”的提法只是表明了其与古典自由主义的不同，并未指明在何处修正、修正了什么，因此没有触及思想内涵，这种提法就显得空泛。“行动的自由主义”只是表明了这派人的外在行为特征，并未涉及思想主张的概括。同时，在进行思想宣传和社会动员层面，在某个时期可能有所侧重，但绝非走极端的“只说不做”或

^① 邓丽兰：《域外观念与本土政制变迁——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政制设计与参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78—279 页。

者“只做不说”路线，所以很难将知识分子进行“理念型”或“行动型”的划分。至于“本土自由主义”的提法，如果仅仅将自由主义限定在思想文化层面，笔者大体赞同这种提法，因为他们确将本土文化传统作为自由主义扎根的土壤。但事实上，这一派学人的思想主张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而并非在所有层面都强调本土化。“本土自由主义”的提法没有将这派人的观念作为一个系统看待。

笔者更愿意使用“调和型自由主义”的提法，因为他们的思想主张最大的特色在于“调和”，以自由主义为基色，调和了中西方多重价值观念。在政治上，调和了国家权力和个人自由，形成“修正的民主政治”主张，进而通过代议制和选举制将修正民主政治与力主社会平等参与的民治主义调和起来。在经济上，他们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国家、社会和个人在生产中的关系作了适当的调和，将侧重分配的普产主义、侧重生产的集产主义以及侧重社会管理的行会自治主义调和起来。在文化上，他们调和了淑世主义与自由主义，将社会改良和传统文化协调起来，发挥个人理性与激情两种因素，追求社会进步、国家复兴、个人自由，超越了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两种极端的文化倾向。所有这些表明，后五四时代知识分子解决“范式危机”的思路与五四时代有所不同。

“范式危机”理论，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中一个重要的解释模式。该理论认为，晚清以降，随着科举制等传统的社会建制被废除，与之相连的意识形态成为缺乏社会基础的“孤魂”。^① 从 1895

① 参见罗志田《数千年中大举动——科举制的废除及其部分社会后果》，《二十一世纪》2005年6月号；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引论部分。在罗先生看来，科举制是一项基本体制，它“上及官方之政教，下系士人之耕读”，在中国社会结构中起着重要的联系和中介作用。因为士是中国官吏的基本社会来源，道统与政统融为一体，科举制被废除使得道统与（转下页）

年到 1925 年，即从“甲午”到“北伐”这 30 年的“转型时代”^①的根本任务是从儒家意识形态范式向现代性范式转变，主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道德和信仰层面的意义危机以及社会政治层面的秩序危机，前者可以看成是由个人修身推导出来的“内圣”问题，后者可以看成是社会秩序——“外王”的问题。^②五四启蒙运动^③希图用“科学”和“民主”来解决意义的危机和重建社会政治秩序。^④但科学在西方已经“驱魅化”，不涉及终极关怀，加上在中国的唯科学主义倾向^⑤，因而无法重建人们的信仰；以民

（接上页）政统两分。其直接后果就是士与大夫的分离，前者变成主要议政而不参政的职业知识分子，则势必出现新的职业大夫即职业官吏，由于缺乏新的职业官僚养成体制——办学堂流于一纸诏书，使政统的常轨社会来源枯竭，原处边缘的各新兴社群开始逐渐进据政统，造成近代军人、职业革命家和工商业者等新兴权势社群崛起。士的消失与农、工、商的难以维持其正业有相当程度的关联，比商人和军人的积极政治参与更加突破常轨的，是游民和饥民这类新边缘社群对政治、军事的参与。这是长久以来的乱源之一。科举制的废除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① 张灏认为这一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前启后的关键时代，因而称之为转型时代，参见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载陈弱水、王汎森主编《思想与学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03 页。

② 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另参见张灏《危机中的知识分子：寻找秩序与意义》，高力克、王跃译，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③ 这里有一个从五四运动到五四启蒙运动名称转换的问题。五四运动起源于国内亲英美派和亲日派之间的斗争在巴黎和会上的展开，围绕“铁路统一案”和“山东问题”，安福系、研究系、交通系、己未俱乐部、国民党及国民党中的小孙派展开角逐，外交只是借口，内政才是关键。五四运动是国内政治势力分化的结果，学生运动只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原本与此无涉的中国共产党，因为要证明自己道统的合法性，对于五四运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反帝爱国运动到思想文化启蒙运动的衍化过程，使得五四运动成为中国共产党建立自己组织的国内思想和组织背景，这种建构形成了长久以来关于五四运动的各种知识。参见欧阳军喜《林长民与五四运动——兼论五四运动的起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6 期；欧阳军喜《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误解及其他》，《历史研究》1999 年第 3 期。

④ 张灏：《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开放时代》1999 年 3、4 月号。

⑤ 关于五四时代唯科学主义的倾向，参见闫润鱼《近代中国唯科学主义思潮评析》，《教学与研究》2000 年第 10 期。

主为核心价值的现代性观念在西方也受到挑战，西方意识本身也出现了危机。按照线性历史进化观的解释，空间上的并置引起时间上的先后，中国以西方为师的努力本身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危机。作为后起者的中国，既要扬西方之长又要避西方之短，职是之故，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便有了“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色彩。^①自 19 世纪中叶至今，中国的现代性转型仍然没有彻底完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许纪霖甚至将 20 世纪的中国思想史看成“一部范式转换的思想史”。^②

高力克进一步指出，因儒家意识形态崩溃而造成的意义危机和秩序危机真正凸显出来是在五四时代，正是五四运动使晚清以降师法西方的现代化运动陷入了范式危机，为重建社会秩序而寻觅意识形态支援的新文化运动自始就负荷着意识形态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紧张，文化与政治的紧张造成新文化运动的分裂，其标志便是 1919 年夏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而文化层面的东西文化论战显示出文化保守主义“重建终极关怀和护存文化认同的主

① 汪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中提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学界通常称之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或“反思现代性”理论，用来说明中国现代化过程的性质和特征），他认为“反现代”的取向“不仅导因于人们所说的传统因素，更重要的是，帝国主义扩张和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危机的历史展现，构成了中国寻求现代性的历史语境。推动中国现代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和国家机器中的有识之士，都不能不思考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如何才能避免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种种弊端”。参见汪晖《死火重燃》，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0 页。汪晖以现代性为阐释角度，希图树立与线性历史进化观不同的多元现代性观念，但问题是，汪晖把现代性本身界定为一种时间概念或者一种“反思性的结构”，也就是说，现代性本身就包含着对于现代性自身的批判，这样说来，“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是同义反复。而把中国现代性重建置于反思全球化过程中作为霸权意识形态的西方现代性基础上，且不说中西现代化的时间差是否如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巨大，就其思路本身而言，也在无意中掉进了西方价值普遍主义的“韦伯式圈套”。

② 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序言》（上卷），东方出版中心 2006 年版，第 1 页。值得注意的是，许纪霖在该书 2000 年版的序言中并没有明确将这个说法提出来，只是转述了张灏等人的看法，时隔六年，许纪霖期间有许多文章也围绕这个主题展开，这个说法可以认为是许氏经过深思熟虑而最终坚定不移的看法。

题”，最终以“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深入到终极价值层面。^①

问题是，转型时代和五四时期并未解决这种范式危机，由儒家意识形态和社会建制崩溃而引发的意义危机和秩序危机在后五四时代仍然存在，这是以上研究者都承认的事实。那么，后五四时代^②的知识界是如何解决范式危机的呢？“再生派”学人群体作为 20 世纪 30 年代寻找中国出路的重要的一派势力，其现代性理念和方案引起了笔者浓厚的兴趣。

在“再生派”学人和范式危机之间有什么关联呢？这就需要考察范式危机未能在五四时期获得解决的原因。这涉及五四时期政治秩序、知识分子的文化态度乃至一直存在的现代化方案等方面的分歧。普遍的看法是，在五四时代，以胡适为代表的文化干将还主要将精力集中在“破”的方面，主要在于进一步冲破封建礼教和伦理的束缚，对于建立由何种主义主导的政治秩序还没有达成共识。此后由于长期战乱，使得这一危机变成亟须一个强力政府推动现代化进程的迫切愿望。掌握在知识分子手中的、原本作为拣选政府依据的合法性的话语体系遭遇了“秀才遇到兵”的尴尬，机遇和强力反过来主导着政权合法性的论证。随着政权更迭，合法性的话语体系被不断置换，“帝制”、“立宪”、“共和”等合法性理论你方唱罢我登场，主导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基础并未完全得到民众的认可，秩序危机也就无从解决。而转型时代之所以没能解决意义危机，张灏认为在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五四时期反传统的极端化做法“两种似乎相对的”因素。他曾将意义危机

① 高力克：《“五四”后的社会文化思潮》，载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史》第一卷（1800—1949），学林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04—308 页。

② 罗志田先生曾有过“后五四时期”的用法，但未作界定。参见其《从科学与人生观之争看后五四时期对五四基本理念的反思》，《历史研究》1999 年第 3 期。罗文所指“后五四时期”约指 20 年代初到 30 年代初，这一时期“科学”、“民主”还继续作为主流话语体系存在。本书“后五四时代”所指的时间段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基本重合，可以简单理解为“五四之后新中国成立之前”。